

太平天国权力结构的演变(1847-1864)

——兼评“杨秀清僭主政治”论

刘 晨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关键词] 太平天国; 权力结构; 上帝会; 僭主政治; 杨秀清

[摘要] 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 由上帝会初创时期的“类垂直的一元架构”发展为天父、天兄鼎立的“非对称的二元架构”, 再发展为洪、杨“对立的二元架构”。天京事变后, 后期太平天国的权力格局主要表现为“错综复杂的一元架构”。而终太平天国之世, 太平天国也没能建立起稳固、高效的权力结构, 这是其覆灭的重要原因。但在没有政权或政权处于流亡状态下, “兵为将有”却是太平军余部最好的“政权”形式。杨秀清时期的极权政治也绝非“僭主政治”, 它只是传统中国社会权臣当政的表现。

[中图分类号] K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4)03-0055-06

关于太平天国起事前后的组织架构、权力消长, 学界多有研究^[1], 但对整个太平天国时期政权权力结构演变的宏观把握尚较薄弱。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分为宗教神权和世俗政治权力, 太平天国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实际归为世俗之权。崔之清先生曾对太平天国权力结构和权力斗争的历史作了系统深入的考察, 提出洪杨二元结构体系的观点^[2]。厦门大学王明前先生新作《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和农村政治》以二元体制为框架重新梳理了太平天国的上层政治, 并提出“杨秀清僭主政治”的观点^[3]。本文拟对太平天国政治权力结构的演变进行探讨, 并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上帝会初创时期(1847-1848)

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一月, 上帝会创始人冯云山被紫荆山士绅王作新捕拿, 上帝会陷于危机。次年(1848)三月, 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传言, 安抚会众。九月, 萧朝贵学步于杨秀清, 迎天兄耶稣来到人间。杨、萧崛起, 上帝会既有权力格局发生变化^[4]。

在杨秀清、萧朝贵分别取得代天父、天兄传言的身份之前, 上帝会的权力系统比较简单。洪秀全在其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 集宗教领袖与政治

元首于一身, 是上帝会中唯一可以沟通神人的角色。据洪仁玕回忆“凡举监缙绅人等, 各皆叹其威仪品概, 故所至皆以身率教。凡东西两粤, 富豪民家, 无不恭迎款接, 拱听圣训, 皆私喜为得遇真命天子也”, “常将此等天理物理人理, 化醒众人, 而众人心目中见我主能驱鬼逐怪, 无不叹为天下奇人, 故闻风信从”^[5]。洪秀全独尊地位的形成, 与他的信徒和盟友冯云山的远见卓识及冯对洪秀全的赤诚忠心密不可分。冯云山是上帝会的实际发动者和组建者^[6], “历山河之险阻, 尝风雨之艰难, 去国离乡, 抛妻弃子, 数年之间, 仆仆风尘, 几经劳瘁”^[7], 但他不居功, 不争利, 仍遥奉洪秀全为教主, 上承洪秀全的宗教指示和行政决策, 传达给各地头目, 再由各地首领将上帝会最高指示传达给会众。一元架构的中枢决策系统, 有力地推动了传教等教务工作的顺利开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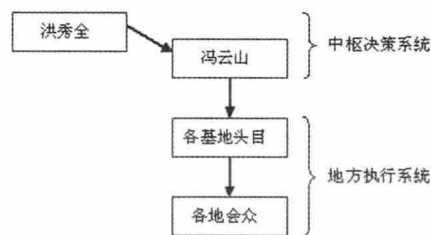


图1: 杨秀清、萧朝贵崛起前上帝会的权力格局

[收稿日期] 2013-04-11

[作者简介] 刘晨, 男, 山东滨州人,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但洪秀全与冯云山为决策中枢的一元架构模式,并非完全垂直,它是一种类垂直结构。洪秀全在会中主要负责编写、阐发教义和宗教体系的创建及维护,冯云山主要负责统筹日常教务的指导、宣传和组织工作,二人分工合作。所以,洪秀全是名副其实的宗教元首和名誉上的政治领袖,冯云山则是上帝会政治上的实际决策者。相比之下,洪秀全的实际权力不如冯云山,他在上帝会中枢决策体系中稍处边缘。但由于洪、冯二人精诚团结,洪秀全对冯云山较为放心,冯云山又具备高尚的品格和稳重的处事作风,上帝会初创时期的类垂直领导体系仍然是相对安全和有效的^[8]。

二、萧朝贵时期(1848-1851)

杨秀清与萧朝贵、天父与天兄确实存在一个共进共主时代。这一阶段存在时间短暂,上限是萧朝贵在戊申年(1848)九月第一次代天兄传言,下限不甚明确,但这一阶段是必然存在的,因为杨秀清和萧朝贵两人都需要一段时间的同心合作与配合,树立权威,继而进入上帝会的核心领导层。

但在杨、萧二人崛起后,上帝会的权力结构绝非单纯的天父天兄与洪秀全的二元架构体系。据研究,“天兄”代言人萧朝贵与“天父”代言人杨秀清之间并非纯粹的同盟、挚友,两人在合作共事的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矛盾和危机,甚至存在对立^[9]。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上帝会的权力结构实际为天父与天兄鼎立的二元结构或天父、天兄、天王的三元架构体系,但主要表现为天父与天兄的二元结构,洪与杨、萧的矛盾在这一时期尚不突出。

经过萧朝贵的苦心经营,在太平天国权力舞台上活跃的主角成为萧朝贵和天兄。据《天兄圣旨》记载,萧朝贵时代,举凡上帝会人事变动、洪秀全行踪、洪秀全家属安置、会众思想教育、会众奖惩、军师人选、私人生活、扯旗与称王时间、中枢决策、金田团营等等无论一切琐碎与关键事务,俱决于天兄(实际是萧朝贵),而洪秀全、冯云山只有俯首受命,杨秀清则处于配角地位,天父传言也被日趋边缘化,萧朝贵基本控制了上帝会的中枢决策系统。

由于已发现的《天父圣旨》不全,天父被边缘化的程度我们尚无从把握,但萧朝贵的主角地位是可以确定的。这一阶段的上限不明确,下限迄于永安封王^[10]。而杨秀清病重前后,自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底开始,整个七月、八月、九月,是

萧朝贵暂代首辅的主政时期^[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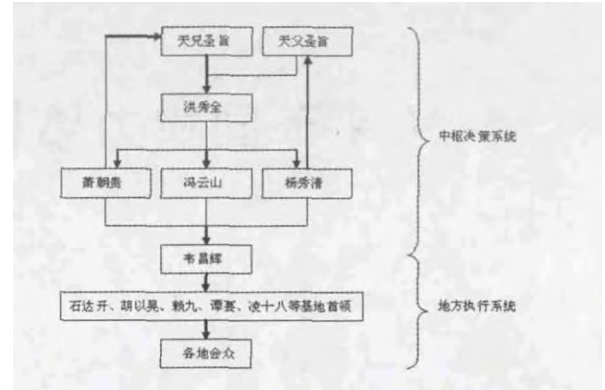


图2 “萧朝贵时代”上帝会的权力格局

萧朝贵通过天兄圣旨,将神的具体指示传达给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形成中枢决策,又通过扶植金田大本营核心力量——韦昌辉,直接管理和领导基地组织的各项工作^[12]。韦一方面参与中枢决策,另一方面直接负责向地方执行系统下达决策命令。在这一运作过程中,天父代言人杨秀清也可以通过天父圣旨直接向洪秀全、冯云山传达指示,但在萧朝贵的打压、排挤下,天父被日趋边缘化,杨秀清神人沟通的空间日益缩减。天兄、萧朝贵、韦昌辉实际垄断了整个上帝会决策的形成、传输、执行过程,洪秀全、冯云山原有的宗教权力、世俗权力都被进一步压缩和损害。

萧朝贵、杨秀清、韦昌辉进入中枢决策体系,扩大了中枢决策体系的范围,有利于集思广益,促进决策系统的程序化运作,从而形成更为可行、明智的政令。但萧朝贵亲手构建的这一格局,无法排除天父代言人杨秀清既有身份和权力的干扰,也无法完全无视教主洪秀全的名誉决策权,所以系统各组成部分在运作过程中会出现相互制衡的现象,影响常规事务的决策效率。萧朝贵为克服这一弊端,采取加速实现上帝会核心中枢地点转移的方法。萧、杨、韦所在的紫荆山和金田村,成为新的决策基地,洪秀全、冯云山被迫奉天兄圣旨“避吉”的花洲山人村等地,则成为名誉上的中枢,下降到附属地位,二者的矛盾和碰撞暂时得到缓解。

萧朝贵时代太平天国的权力格局,在天兄的高压政策下,在萧朝贵的精心策划下,天父、天兄,杨秀清、萧朝贵因权力争夺产生的矛盾暂时得到缓解;萧朝贵与洪秀全、冯云山因权力再分配产生的摩擦也被人为地进行空间上的搁置,太平天国得以顺利完成起义建政前最为重要的准备工作——金田团营。

但这一权力格局,是“非对称”的二元架构体系。所谓“二元”,并非指杨、萧与洪、冯二元,而是天兄、萧朝贵与天父、杨秀清的二元。这种架构建立在萧、杨之间客观实力相对均衡的基础上,是各种势力相互妥协和利用的产物。随着杨秀清势力的复苏,再加上萧朝贵亲手组建的权力关系网络中各种不和谐因素的暴露,各种势力亟需冲破既有权力格局,实现政治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萧朝贵时代本不对称的格局构架就愈发不稳定。

以萧朝贵与石达开的关系为例。《天兄圣旨》唯一一次记载石达开发表言论是他顶撞天兄。道光二十九年(1849)底,贵县六屈村发生上帝会与当地武装周凤鸣的战斗,上帝会取得胜利后,天兄下令班师。石达开、王玉绣、叶享才俱说不可班师。天兄大怒,厉声曰“据朕子爷在高天看来,都无些指甲事情。尔等何竟毫无胆识也?石福隆等家粮草将尽,尔还不知么?”石达开仍然坚持道“小弟二人在后顶起也。”石达开坚持己见,出乎萧朝贵之意料,天兄被迫无语回天。但萧朝贵没有就此罢休,四天之后,天兄令刘文明、叶享才回贵县告诫石达开:“不好信人挑唆也。”^[13]其言外之意是警告石达开要和赐谷村王家(王玉绣等,为萧朝贵主要打击对象)保持距离。可见萧、石关系并不和睦。自此,石达开在萧朝贵的压制和孤立下,再未对天兄发表任何异议^[14]。

萧朝贵通过对洪秀全的挟持与控制,对冯云山的排挤与打击,对石达开的压制和孤立,对杨秀清的合作与斗争,对韦昌辉的拉拢与扶植,营造了一个并不十分和谐的太平天国核心层人际关系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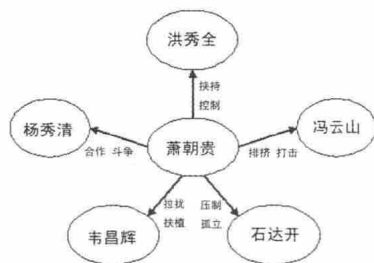


图3: 萧朝贵与太平天国其他核心领导人的关系

不稳定的二元架构体系,各种势力的此消彼长,不和谐因素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决定了萧朝贵时代太平天国权力格局的短暂命运。它在获得起义胜利,迎来太平天国突进永安的辉煌的同时,也在一步步地走向解体的深渊。

三、杨秀清时期(1851 - 1856)

萧朝贵、杨秀清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利益的

冲突与权力的角逐。这是一股暂时难以超越地表而喷发出来的暗流,被较为成功地限定在合作的表象之下。但是,萧、杨之间的较量,也有可能发生裂变。历史总是会出现奇迹,当萧朝贵几乎取得和杨秀清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可以有可能会再次触及最高权力的时候,咸丰元年(1851)十月十八日永安城外发生的水窦村之战,萧朝贵身受重伤,使得其政治生涯告一段落。

水窦村战役后,萧朝贵身受重伤,丧失了参与政治军事活动的的能力。也正是由于他的重伤,甚至有生命危险,洪秀全才不得不完全倚仗雷厉风行、办事干练且具有天父代言人这一神秘崇高身份的杨秀清。十月二十五日,永安封王,天王授予东王节制诸王的全权,这固然是出于时局的需要。因为此时,除了杨秀清和伤重有生命之虞的萧朝贵,其他三王都不具备总揽全局、指挥全军的实力及宗教身份。在原先本已一步步取得和杨秀清几乎平起平坐地位的萧朝贵,丧失自己更高的权力,自动退出权力核心。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格局就在西王重伤后的第七天,发生了一场悄无声息的重大转变^[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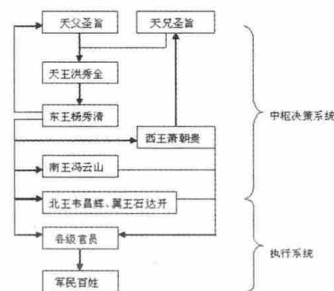


图4: 永安封王后太平天国的权力格局

永安封王使杨秀清在政治上一人独大,他通过天父的意志限制洪秀全的宗教权力,排挤洪秀全的世俗权力空间,继而以政治(左辅正军师)和宗教(天父代言人)的双重权力身份,统领西、南、北、翼各王及文武百官,管理天国军民。但天兄代言人西王萧朝贵在宗教权力系统中的作用尚在,他可以通过天兄的意志一方面抑制天王权力,另一方面可以牵制天父权力在整个太平天国宗教权力系统中的膨胀,进而以宗教身份制衡杨秀清的某些政治行为。可以说杨秀清、萧朝贵二人在宗教层面还有一定的制衡因素存在,尽管天兄在神秘话语体系中已近于缄默,并且被日趋边缘化;而南王冯云山依然是天国上下认可的上帝教的实际创建者,他是洪秀全最忠实的盟友,对太平天国的贡献和在太平天国中的资历仍然不能被抹杀。因

此,萧朝贵是牵制杨秀清在宗教权力系统中权势恶性膨胀的重要力量,而冯云山则凭借他的资历和功劳对太平天国诸王在世俗权力方面起着调节作用。

但不久,冯、萧二王先后战死,带来了既有权力格局中大片的权力真空。洪秀全对世俗权力系统的重建依然采取沉默的方式,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东王杨秀清则顺利接管了萧朝贵、冯云山的权力,同时采取各种方式不断打压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及秦日纲、胡以晃、陈承瑢等中央实力派,将他们排挤于权力核心体系之外而仅具有服务于东王的政治角色。北王韦昌辉位次虽上升为第三位并且具有后护又副军师的身份,但他最为倚赖的盟主萧朝贵的离世,意味着他失去了进一步拓展权力空间的可能。韦昌辉也只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事东贼甚谄”^[16],“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17]。翼王石达开则只是20出头的年轻人,而且他不具有军师的身份,距中枢权力核心较远。于是,洪、杨矛盾充分暴露,“对立的二元架构”体系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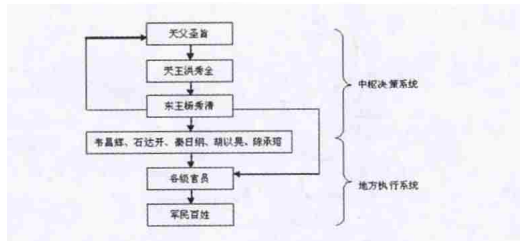


图5: 冯、萧死后太平天国的权力格局

杨秀清还进一步阻断政治信息的畅通。张德坚《贼情汇纂》记载“凡紧要奏章若无杨逆伪印,洪贼不阅,故一应奏章必先送杨贼处盖印,虽昌辉自奏亦不能径达。”^[18]在闭塞的信息流通领域里,入天京后仅一年多的时间,洪秀全便被杨秀清架空。咸丰四年(1854)英国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访问天京,他报告说“至于像太平王这样一个人是否真的存在,仍是很值得怀疑的一件事,因为在我们同将军等人所有的通信中,对方刻意向我们大谈东王的意愿,他的权力,他的威严,他的影响,但只是顺便提及他那驰名的主子。东王显然是他们政治和宗教体系中的原动力。”^[19]外国人也清楚地看出,杨秀清处在整个太平天国权力的中枢,他已有足够的砝码抗衡洪秀全,只待野心暴涨,权力之争,一触即发。

四、后期太平天国(1857 - 1864)

天京事变后,首义诸王或死或走,天父、天兄

的神话体系破灭,洪秀全宸躬独断。为弥补既有权力空白,洪秀全修补而成后期太平天国错综复杂的一元权力结构,最终形成以洪仁玕、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林绍璋为首的中央亲贵权力体系和以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权力体系。

在后期权力结构运作模式中,洪秀全可直接或通过亲手提拔起的中央权贵向地方实力将领下达王命,操纵政权机器。但中央的威信和管辖权在天京事变后遭到严重削弱,缺少军功资本的洪仁玕、蒙得恩等中央权贵的行政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掌握重兵、各据地盘的李秀成、李世贤等实力派的抵制。洪秀全和中央权贵不得不联合、依赖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参与中枢决策的形成,并付诸实施。按李秀成自己的话,洪秀全“一重用幼西王萧有和,第二重用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第三重用干王洪仁玕,第四重用其驸马钟姓、黄姓,第五重用英王陈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20]于是在中枢决策系统和地方执行系统之间形成了地方决策和执行系统,严重影响了中央决策的输出与支持。

但是,洪秀全也直接参与地方决策和执行事务,直接向地方各级将领下达诏令,后期分封诸王使其各自招兵,使各级将领纷纷纳入地方决策系统,干预地方决策的形成。李秀成、陈玉成等实力派对各级将领的统属地位遭到严重动摇,地方决策的输出与支持又陷入瘫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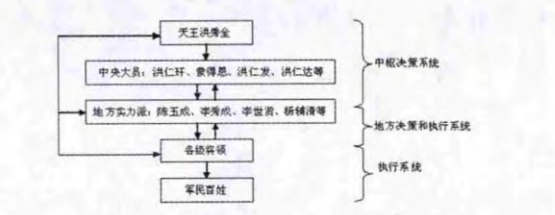


图6: 后期太平天国的权力格局

后期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就是处于中央和地方、中央内部、地方内部等各种矛盾的错综复杂和交织中。党争日炽,政令不通,国家机器锈蚀钝化,危机重重。李秀成总结太平天国的失误,关于权力结构者有二“误封王太多,此之大误”,“误立政无章”^[21]。这或是他们血的教训吧。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政权的权力结构经历了复杂的演变。

终太平天国在世,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领导层始终未能建立起稳固、高效的权力结构,这是太平天国覆亡的重要原因。

但历史的缔造,有时亦会得自偶然。太平天国天京政权的倾覆并不代表太平天国的终结,后期太平天国权力结构中残存的地方决策和执行系统在太平军余部发挥了作用,太平军余部的军政权力较为成功地过渡和衔接起来。在南方,太平军余部的军队指挥权实现了由侍王李世贤(二等王)、康王汪海洋(三等王)到偕王谭体元(四等王)的较好承接^[22];在北方,遵王赖文光虽仅是捻军各旗名誉上的盟主,但从其上司扶王陈得才处接管过来的原西北太平军余部则一直效忠于他,直至同治五年(1866)底在扬州覆灭;而太平天国旗帜的最后坚持者,在西北有梁王张宗禹的部将袁大魁(于陕西覆灭)、在西南有翼王石达开的部将亲天燕李文彩(于贵州覆灭),他们分别坚持到同治八年(1869)和同治十一年(1872)。可见,在没有政权或政权处于流亡状态下,“兵为将有”或许是最好的“政权”形式。洪秀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观愿望破灭,却在他本人身死、人间天堂坍塌后获得了客观收益,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五、关于杨秀清的“僭主政治”

近有学者在其著作中提出杨秀清的统治为“僭主政治”^[23],笔者以为此说值得商榷。

“僭主”(Tyrant)一词源于古希腊,原指政权的篡夺者,后有暴君之意。学界对“僭主政治”研

究颇多,对其界定和特征都有论述,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政治思想家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的《论征服的精神与僭主政治》。贡斯当结合法国大革命中拿破仑的统治,论“僭主政治”是“一种不可能被修正或软化的力量”,其主要特征是:1. 僭主政治首先是不合法的;2. 僭主政治的权力范围以及运作不受任何制约;3. 僭主政治的统治成本极为昂贵;4. 僭主政治的日常统治方式为对内高压、对外征服^[24]。

很明显,杨秀清的统治不符合“僭主政治”最主要的两个特征:不合法和不受限制。结合上述分析,在太平天国“非对称的二元架构”和“对立的二元架构”中,杨秀清的权力始终受到其他政治力量(洪、萧、冯、韦、石、秦等)的限制和束缚。覆灭前,要洪秀全封其万岁也是杨秀清反限制的白热化举动,杨秀清所谓不受限制的权力始终也未能建立起来。另外,杨秀清极权的建立是合法的,从“天父下凡传言”到“节制诸王”,甚至“封万岁”都是经洪秀全认可的^[25]。

因此,杨秀清的极权政治,既不同于古希腊时期具有阶层“中介”地位,从旧氏族共和体制中获取政权的暴君政治,也不是贡斯当所谓具有近代特征的“僭主政治”。它只是传统中国社会“党争”的体现或是主弱臣强而致权臣当政的一种形式。

[参 考 文 献]

- [1] 参见王庆成《〈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和太平天国历史》,《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饶任坤《试论杨、萧怎样夺取金田起义领导权》,《广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苏双碧《〈天兄圣旨〉——洪、萧互相利用的产物》,《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梁义群《拜上帝会领导核心形成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等。
- [2] 参见崔之清、胡臣友《洪秀全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241页。
- [3] [23] 参见王明前《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和农村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155页。
- [4] 关于“拜上帝会”之名称,夏春涛考证应为“上帝会”(夏春涛:《“拜上帝会”说辨正》,《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笔者赞同此说。关于上帝会创立的时间,学界存有争议。传统观点认为:洪秀全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创立“上帝会”,王庆成认为上帝会是冯云山“在1846年建立的,或者说,它建立于1846年至1847年夏以前的一段时间内”。(王庆成《“拜上帝会”释论》,《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51页。)但上帝会应是随“拜上帝”行为的系统化、成熟化而自然形成的产物,并不一定要有一个正式宣布成立的时间。所以本文研究的时间上限定在1847年即杨、萧“代天言事”的前一年。
- [5] 《干王洪仁玕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续编》)(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8、409页。
- [6] 王庆成《“拜上帝会”释论》,《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64页。
- [7] 《天情道理书》,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一),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371页。
- [8] 洪秀全与冯云山之间并非完全没有矛盾。据《太平天日》记载:(道光二十四年)七月时候,主见表兄家苦,甚难过意,适与南王到田寮,语言有拂逆,主即回赐谷村,与南王冯云山、洪仁球、恤王洪仁正等议回东省”(《太平天日》,《太平天国》(二),第644页。)此后,洪秀全返回花县,冯云山则转至紫荆山一带继续传教,二人分道扬镳,一别三载,互不联系,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七月十七日洪秀全、冯云山才再次在紫荆山相会。
- [9] 刘晨、刘平《“天兄”超越“天父”的尝试——金田起义前萧朝贵与杨秀清的关系》,“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广州花都,2011年11月,第338-344页。
- [10] 这一阶段的下限并非是杨秀清康复的庚戌年十月初一日《天

情道理书》,《太平天国》(一),第367页)。据《天兄圣旨》记载,杨秀清康复后,出于各种原因,萧朝贵确有近四个月的缄默,在太平天国权力格局中“天兄”与“天父”逐渐位移。但金田起义立国后,天兄复出,在太平天国的神坛和政坛上又开始发挥一定的作用,这种势头虽已大不如前,二者仍足成鼎立之势,或可为“萧朝贵时代”的后期。永安封王后,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杨、萧地位才发生根本性变化。参见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91页。

- [11] 根据《天兄圣旨》,自庚戌年(1850)六月底天兄接见洪秀全家人,开始十分频繁地下凡理事,七月、八月分别下凡多达10次、16次,萧朝贵也开始了自己的首辅生涯,而杨秀清此时则因身体状况不佳,逐渐退居二线。参见《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一),第366页;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48-52、57-58、66、74页。
- [12] 韦昌辉是萧朝贵亲手提拔并培养起来的。《天兄圣旨》记载:“天兄谕韦正曰‘韦正,尔呼朝贵为何?’韦正时却未知何样称呼,语言迟出。天王问天兄基督曰‘天兄,韦正在高天与小弟兄们是同胞否?’天兄曰‘他同朕们总是共条肠也。’”(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16-17页。)韦昌辉正式步入上帝会和太平天国领导行列,成为萧朝贵的嫡系。此后,萧朝贵还把上帝会大本营设在金田,多次安排韦昌辉处理重要事务,韦昌辉的出场也总是与萧朝贵在一起。
- [13] 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31、35页。
- [14] 石达开在起事前后的较长时间内不为人们关注,直到咸丰二年(1852)十月他的名字才开始出现在清廷征剿大吏的奏报中。也正是在萧朝贵殒命长沙后,石达开的军事才华方得崭露。又按太平天国以“左为上”为原则,如杨秀清的“左辅”要高于萧朝贵的“右弼”,初封五军主将时,石达开的“左军主将”级别应高于韦昌辉的“右军主将”,只是在后来的进军途中发生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政治变动,韦之地位超越石,或与萧朝

贵的压制有关。

- [15] 刘晨《再探“洪宣娇”》,《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刘晨、刘平《“天兄”的缄默——水窦村之战后萧朝贵踪迹考》,《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
- [16]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四),第669页。
- [17] [18] 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48页。
- [19] A Report by W. H. Medhurst and Lewin Bowring, in Prescott Clarke and J. S. Gregory (eds.),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A Selection of the Documents*.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63.
- [20] [21] 《忠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续编》(二),第366、397页。
- [22] 昭王黄文英在自供中说“那天朝的王有五等。若从前的东西南北四王、翼王,现在的干王,执掌朝纲,是一等王;若英王、忠王、侍王,执掌兵权,是二等王;若康王、堵王、听王会打仗的,是三等王,若我与恤王,是四等王。那五等王一概都叫列王。”(《黄文英供词》,《太平天国续编》(二),第442页。)
- [24] [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贡斯当政治论文选》,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8-401页。学界对贡斯当“僭主政治”的研究也有总结,参见Helena Rosenblatt, "Why constant a critical overview of the Constant revival",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1, 3(2004), p. 439.
- [25] 在太平天国后期的官方文献里,洪秀全只承认他和耶稣、杨秀清是上帝之子。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洪秀全在给英国特使额尔金的诏书中说“朕乃上帝第二子,哥暨东王同胞连。”(《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页。)他在《钦定旧前遗诏圣书批解》中也提到“东王是上帝爱子,与太兄及朕同一老妈所生”(《钦定旧前遗诏圣书批解》,金毓黻、田馥庆等编《太平天国史料》,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85页。)

The Process on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1847 - 1864) ——and Discuss "Yang Xiuqing's Tyranny"

LIU Chen

(History Depart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 Words: power structur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Shangdi Hui; Tyranny

Abstract: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s power structure had a complex process: from "similar monistic unary architecture"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Shangdi Hui to "dual structure" between Heavenly Brother and Heavenly Father, and then to "dual opposite structure" between Hong and Yang. After the Tianjing incident,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s power structure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intricate monistic architecture". And by the end of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it also failed to establish a stable, efficient power structure, which was an important reason of destruction. However, the form of "soldiers belong to general" is a better form for the remaining troops of Taiping when there was no government or a refuge government. Yang's domination is not "tyranny" but a show of powerful minist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责任编辑:刘一兵]